

关于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扎西顿珠

姑茹玛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1640年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之后，五世达赖喇嘛派贡本曲杰扎西顿珠去担任喀尔喀车臣汗部首领硕垒的供应喇嘛。此人从第一世始，被冠以“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称号，历代掌管车臣汗部的宗教事务。本文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莅临喀尔喀的历史背景、世系以及影响作以考察。

关键词: 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应喀尔喀蒙古左翼两个汗王，即土谢图汗衮布（1614-1657年在位）和车臣汗硕垒（约1630—1655年在位）的请求，给土谢图汗次子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3-1722）捎去“诗体书信”，给车臣汗硕垒派去一名“供应喇嘛”。前往车臣汗部的喇嘛史称“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本文将对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作一考察。

一、历史背景

清代的喀尔喀（明译罕哈或哈刺/拉哈）是蒙古中兴时期的达延汗（1473—1516年在世，1479—1516年在位）第十一子格呼森扎（Geresenje，明译格列山只）的封地。它的前身是北元时期蒙古中央六万户中的左翼三万户之，最初游牧在哈拉哈（Qalq-a）河流域，部以河得名。“喀尔喀”是“哈拉哈”的另一种汉文译写。初封首领格呼森扎死后，其七子析产，形成了北喀尔喀七和硕，亦作鄂托克（和硕、鄂托克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16世纪末17世纪初，格呼森扎七子后裔中先后有三人称汗，形成三个独立的游牧集团，分左右二翼，即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左翼土图汗部和车臣汗部，史称“喀尔喀三个汗部”^①（或“漠北蒙古”），清代的“喀尔喀蒙古”指的就是这一部分了。

众所周知，1636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十六部首领拥戴皇太极（1627-1644年在位）为“博格达彻辰汗”（意为“圣睿汗”），成为大清王朝的子民。为安抚不久前投服的漠南蒙古，同时为笼络漠北喀尔喀蒙古，使之早日投附清朝，皇太极借助蒙古人对藏传佛教崇信的观念，决定迎请达赖喇嘛驾临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崇德二年十一月，清廷派察罕喇嘛等人出使喀尔喀车臣汗部，透漏此消息。^[1]喀尔喀左翼两个汗王，即车臣汗和土谢图汗闻讯后积极响应，立即遣使，以喀尔喀三汗^②的名义提议，与清廷一道遣使迎请达赖喇嘛。

1637年（崇德二年）八月，以车臣汗和土谢图汗为首的喀尔喀使团抵达盛京，向清朝皇帝和皇太后问安献礼，请求崇德帝“迎请达赖喇嘛时路过喀尔喀”。遣使的除车臣汗硕垒以外，均为土谢图汗部贵族。这也充分证明了左翼两部对呼图克图转世问题上的积极态度。车臣汗的奏文如下：

“Oom suwasdi siddam: Maq-a samadi sečen qa γ an. bu γ da-du bičig bariba. bu γ da mend ü buyu. bide ende mendü bui dalai lama-yi jalay-a gegči jöb buyu ende dolu γ an qosi γ u qalq-a jalay-a geji bai γ -a bile basa dörben oyirad jalay-a gegseger bile tani jalay-čin .mani da γ arin ir-e qamtu-yar yabu γ san jöb buyu γ urban qa γ an-i mani ü ge nige jöblegsen bai bide γ urban-u üge nige-yin tulada mendü asa γ un elči-ben

ilegegči ene bile. bičig-ün beleg-tü. döčin bolaγ-a döčin aduγu bai. elči mani sečen qonjin biligtü sanjin qoyar bai: ” [2]

汉译：“愿吉祥！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奉书于博格多。博格多安否。我等在此安居。闻欲延致达赖喇嘛，甚善。此地喀尔喀七和硕欲请之，四卫拉特亦欲请之。贵国往请者，过我境，同往请则善。我等三汗已合议，故同遣使问安。书礼貂皮四十张，马四十匹。使臣麻尼塞臣浑津、毕礼克图山津二人。”

土谢图汗的信与车臣汗略同。

同年十一月，崇德帝派车臣绰尔济（Sečen čorji）前往西藏通报此事。但写给藏巴汗（1618-1642年在位）的信中未提及迎请达赖喇嘛一事，而是让使臣口述清朝意图。[3]按照承诺，1639年（崇德四年），清廷又派察罕喇嘛（Čaγan lam-a）等人，途经归化城，准备与喀尔喀三汗使臣一同前往西藏。使臣到达归化城后，崇德帝命令他们不得在归化城久留，先派使臣去喀尔喀三汗处，尽快约定会合地点。[4]但到这一年冬天，清朝突然中止了与喀尔喀一同迎请达赖喇嘛的计划。根据崇德皇帝的说法，这是因为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态度不明。依笔者是之见，其原因不只是扎萨克图汗等人的“态度不明”，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5]

喀尔喀三汗与清朝共同邀请达赖喇嘛之事终未能如愿。但喀尔封建主与藏传佛教高层间的往来却异常活跃。1641年（崇德六年）春③，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派名叫乌拉布三津（Ulabuu sanjin）的使臣，迎请卫拉特蒙古著名的高僧咱雅班第达（Zaya bandida）到喀尔喀传教。咱雅班第达“从扎萨克图汗处应邀到土谢图汗那里，随后又接到马哈萨嘛谛车臣汗的邀请。咱雅班第达用神圣的教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成了七和硕三大汗的供奉喇嘛”。[6]在喀尔喀期间，咱雅班第达传布教义，翻译经文，广开布施。[7]兹拉特金则认为，咱雅班第达“作为喀尔喀三汗的客人，在那里推行的是准噶尔大会上通过的路线。恐怕不能怀疑：他和巴图尔浑台吉一样是清朝的反对者，并且不赞成采取讨好清朝的政策。……必须着重指出，咱雅班第达积极促进了准噶尔大会的思想和决议的贯彻”。[8]咱雅班第达对清朝的立场如何，我们没有史料依据，所以不能评说这位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对与错，但是咱雅在喀尔喀宣传1640年大会盟的思想应该较符合事实。

在邀请咱雅班第达的同时，喀尔喀左翼两汗遣使西藏，开始与五世达赖喇嘛亲密接触。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载，1642年初，喀尔喀左翼两汗首次遣使五世达赖喇嘛，参加新年祈愿法会。“特别是喀尔喀多尔济嘉布（指土谢图汗衮布）的代表将上顶用白旃檀木作支架的漂亮的缎子蒙古包很利索地展开，并扎在空地上，将我请到里面，进行招待，馈赠礼品，还邀请我去蒙古。”三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离开哲蚌寺，前往后藏。六月二十一日，喀尔喀的使臣从鲁浦林卡返回。[9]

达赖喇嘛很热情的接见喀尔喀两个汗王的使臣，接受其礼物，并设宴招待使臣，允许其随行布施。同时，使臣返回时，给哲布尊丹巴派去一名经师，给车臣汗派去一名供应喇嘛。目前还没有史料记载达赖喇嘛曾亲莅喀尔喀蒙古，但建立不久的噶丹颇章政权需要蒙古人的鼎力相助。达赖喇嘛出于这一需要，对喀尔喀表现出较友好的态度。西藏方面的友善态度，与清廷利用黄教高层统治喀尔喀的策略不谋而合。基于满、蒙、藏三方的利益驱使，蒙藏地区普遍器重转世活佛。从而，一方面蒙古地区的佛教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座法床、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驾临并转世漠北，喀尔喀地区开始寺庙林立、僧侣骤增，神权开始左右喀尔喀蒙古人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清廷则通过西藏黄教首领，开始干涉喀尔喀的内政，使之逐渐成为清廷的藩属。

二、身世及转世

“伊拉古克三”（蒙古语 ilaγuγsan），有“胜者”、“常胜”之意。“呼图克图”（蒙古语 Qutuγtu），“呼图克 Qutuγ”为蒙语音译，其意为“福”、“寿”，“图tu”为“有”，合为“有福之人”、“有寿之人”，意即“圣者”、“圣人”或“化身”，汉语称“活佛”。《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的解释也基本同上。[10]关于呼图克图的来历，《蒙藏佛教史》称，二世达赖喇嘛贡敦嘉措（1476-1542）将

其弟子称呼图克图，分掌教化，“呼图克图之称始于此”。[11]清代，“呼图克图”即朝廷授予蒙、藏地区黄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据史料记载，在清代蒙、藏历史上至少有五位带有“伊拉古克三”法号的黄教高僧。④喀尔喀地区有两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是赛音诺颜部祖图门肯昆都楞（Tümengken köndelen）后裔，为喀尔喀蒙古人。另一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即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

喀尔喀蒙古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世叫达什敦多布（这是蒙古人的读法）。《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为“扎西顿珠”，《安多政教史》汉译为“扎喜端珠”[12]，两部书指同一人。此人应该指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家波兹德涅耶夫所描述的喀尔喀蒙古的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据波氏记载，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世，应车臣汗硕垒之请求，五世达赖喇嘛从色拉寺派往喀尔喀，时间是1642年。当时，达赖喇嘛照例在鲁布林卡附近的色拉寺、木鹿寺讲经。喀尔喀左翼两个汗的使者跟随达赖喇嘛参加此次讲经会，又从鲁布林卡返回喀尔喀地区。时间、地点、事件正好与《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相吻合。

波兹德涅耶夫于1898年出使清朝，从北京返程之际途经喀尔喀，在车臣汗部赫列和硕（Qira qoši yu）附近遇见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侍卫（Soyibun），波氏从该侍卫那里收集到有关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信息。据其描述，“喀尔喀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第一世名叫达什敦多布，他是应喀尔喀车臣汗的请求，于1642年被五世达赖喇嘛由西藏色拉寺派往外蒙古的”。二世叫罗卜桑岱钦，其确切生年不详，应该生于1644—1661年间，雍正二年（1724）圆寂。三世伊什普林赖巴勒楚尔札木卓，生于1725年，卒于1747年，享年二十三岁。第四世罗卜桑雅拉姆彼尔生于1748年，其寿命不长，卒于1772年。第五世罗卜桑巴尔丹，生于1773年，死于1819年。第六世叫罗卜桑巴尔丹吉格梅特，1820年生，1861年卒。这位呼图克图逝世后，为找其转世费了不少时间，直到1865年第七世才出生。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调查时，这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还在世，其侍者前来与他们交谈，道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祖先的传承史。[13]

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世，是黄教第二大寺色拉寺结巴（或写作居巴）札仓的额尔德尼绰尔济喇嘛，藏族，其生年不详。他于1642年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成为车臣汗硕垒的供应喇嘛，从此在喀尔喀车臣汗部形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宗教势力。从其1647年遣使入清来看，其卒年应晚于1647年。李保文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于1647年四月五日与其施主硕垒车臣汗遣使清朝，他与前往清朝使臣一同抵达呼和浩特，派其使臣赴京，自己则留在呼和浩特，并于此间客死呼和浩特。[14]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有些欠强。1646年“腾机思事件”败绩后，喀尔喀土谢图汗和硕垒汗逃往色楞格河地方。1646—1650年间，俄罗斯使臣多次到访硕垒车臣汗营地。据俄国使臣的报道，当时车臣汗的营帐在鄂尔浑河畔，其大部分属民也沿着该河驻牧。[15]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使臣同车臣汗硕垒、土谢图汗衮布使臣一同抵京来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想必和硕垒汗一起移牧鄂尔浑河流域。并且，“腾机思事件”中满蒙双方，尤其是战败者喀尔喀方面损失惨重。清廷利用这一时机，加进对喀尔喀的渗透，不断施加压力。喀尔喀方面也不感示弱，导致双方关系陷入僵局。在这一敏感时期，作为车臣汗部的一位重要人士，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不敢亲自贸然前来已处于满州人统治下的呼和浩特地区。笔者赞同1647年清廷派“土默部落德穆齐达尔汉囊苏送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丧，还其部”[16]指的是那密克籍的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这一说法。[17]

罗布桑普尔赛（Lobsang perlai）于1709—1715年间所著“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传”附录列有哲布尊丹巴的后学弟子，其中有三位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位是继位香喇嘛的伊拉古克三呼毕勒罕；一位是甘丹寺绛孜札仓喇嘛却钦嘉措的转世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另一位是哲蚌寺果芒札仓喇嘛的转世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18]罗布桑普尔赛是哲布尊丹巴一世亲传弟子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位活佛，书中所记均为作者亲历的事件，较可信。这里所记的第一位伊拉古克三号为“呼毕勒罕”，应未满18岁。第二位，笔者认为为本文研究对象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1709—1715年间，应为第二世，出生于顺治年间，1724年圆寂。有清一代，喀尔喀地区只有一位拥有“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称号者。因此，其转世应信从《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即为色拉寺的额尔德尼绰尔济喇嘛扎西顿珠，而不是“甘丹寺绛孜札仓喇嘛却钦嘉措”。第三位应该是赛音诺颜部图门肯后裔伊拉古克三呼图克

图。《大黄史》记为“伊拉古克三诺颜呼图克图”[19]，《阿萨喇克其史》记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20]

遗憾的是，从第二世开始，其族别，即藏人还是蒙古人；他与西藏黄教高层，尤其是与五世达赖之间的互通往来以及其讲经的寺院规模、牧地、僧侣人数等信息我们知道的甚少，留待以后再研究。但需要说明的是，喀尔喀蒙古“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称号，1691年“多伦会盟”之前由五世达赖册封。即，一、二世的称号是五世达赖喇嘛赐予的，且从第二世开始冠有“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号。1691年喀尔喀入清之后，应由清廷封赐，且年满十八岁（蒙古人的计算法是按虚岁）。年满十八岁之前，称之为“呼毕勒罕”（蒙古语Qubilγan），意为“化身”。

三、事迹、影响

当时，喀尔喀左翼之一的车臣汗部没有掌管宗教事务的著名僧侣，车臣汗硕垒曾极力拥戴土谢图汗衮布家族认定活佛一事。[21]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车臣汗部后，从一世开始，主持车臣汗部的宗教事务，其影响深远而持久。

首先，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硕垒汗第七子阿南达额尔克琿台吉（Ananda erke qung tayiji）“专门剃度”。[22]1841年成书的《水晶珠》记其为“贝子那满岱济农”（Namandai jinong）。[23]《游牧记》记录硕垒诸子时，将阿南达时称之为硕垒的第十一子，号达赉台吉[24]，即幼子。《游牧记》的这种记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据《大黄史》，阿南达号“达赖济农”，“达赖济农”是硕垒的称号，阿南达显然继承了其父汗昔日的名号。根据蒙古人的习俗，析家产时，长子和幼子所得最为丰厚。因阿南达是硕垒的嫡幼子（兄弟中排行第七，而非末子），继承了“达赖济农”称号，在硕垒诸子中地位显赫。硕垒汗邀请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专门为其嫡幼子阿南达剃度，使之皈依佛教，这一举动充分说明，车臣汗部从汗王开始，非常尊崇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这里也不排除硕垒汗将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转世其家族的想法，因史无确载，对这一问题暂存疑虑，留待以后再研究。

其次，作为车臣汗部宗教势力的代表，遣使清廷。顺治四年（1647）夏四月丙子，“喀尔喀部落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遣使来贡，宴赉如例”。[25]这是清朝官、私史书所记一世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唯一一条信息。这里称其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并不冠以“额尔德尼”称号。除上述活动外，一直到第五世，有关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记载不足，无法考证其活动。

据《大清会典》，从第五世开始在朝廷供职。乾隆五十八年（1793），理藩院进呈应到朝廷任职的喇嘛名单：“以察哈尔额尔德尼诺木齐罗本绰尔济大喇嘛一人，喀尔喀额尔德尼伊拉古克散喇嘛一人……为第二班”。[26]波兹德涅耶夫认为他是呼毕勒罕中“第一个开始定期朝觐皇帝并且在皇宫供职的人”。并从第五世开始，其转世都第二批前往北京供职。第七世呼图克图向清廷捐赠一大笔银子，同治皇帝（1862-1875年在位）赐“乃布泰尔黑车臣”（蒙古语Nebterqei sečen，意为明哲）尊号，光绪皇帝（1875-1909）则赐给其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所有称号以及管理沙比纳尔（蒙古语，指寺院的侍从）的权力。并于1881年新年之前，被召到北京，在北京举行预定的呼拉尔（蒙古语，即法会），并“觐见皇上”。但此次“没有获得任何赏赐”，而且六年之后，皇帝再次召见第二批活佛时，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没有接到赴北京的邀请”。与波兹德涅耶夫相遇的侍从，很可能是前往北京申诉此事。

据波兹德涅耶夫描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牧地在赫拉贝子旗与呼伦贝尔郡王旗之间。[27]赫拉贝子旗，又称中前旗，为上述硕垒汗嫡幼子阿南达后裔的游牧地。阿南达驻牧克鲁伦河北索尼河，附清后其子孙驻牧跨克鲁伦河地界，其东、东北、东南三边接呼伦贝尔界。[28]喀尔喀初编佐领时，车臣汗部设十一旗，后增十二旗，到1756年共设二十三旗。在整个二十三旗中并没有称之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旗。从波氏的记载我们可以断定，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应该驻牧于固山贝子阿南达子孙管辖的中前旗，即“赫拉贝子旗”界内，位居克鲁伦河下游车臣汗部乃至整个喀尔喀蒙古之东部。但其牧地的规模、所建寺院及其僧侣的数量不详。

总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扎扎西顿珠驻喀尔喀后，为车臣汗硕垒嫡幼子剃度，使之皈依佛教；

遣使清廷献方物；从第五世起在宫廷任职。他在车臣汗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是非凡的，如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土谢图汗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在车臣汗部具有很高的地位。据波兹德涅耶夫记载，车臣汗部部民认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是“喀尔喀所有格根之中地位最高者，甚至比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地位高”。^[22]这只是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侍者的看法。事实上，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只是车臣汗一个部的供奉喇嘛而已，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则从一世开始既是出身于土谢图汗家族，又是“喀尔喀诸王及喇嘛中之独尊者”^[29]，在喀尔喀政教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从上述记载来看，额尔德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只是喀尔喀左翼车臣汗一个部的供应喇嘛而已，其对喀尔喀政教领域的影响远不及哲布尊丹巴。它的存在，必定是满、蒙、藏三方的利益、冲突的产物。

注释

①三个汗部，即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左翼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雍正三年（1725）年从土谢图汗部中分离出赛音诺颜部，形成四个汗部。

②即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

③巴根那博士认为，咱雅班第达在喀尔喀传教的时间是1639年末到1640年。（巴根那：《16-17世纪的喀尔喀与卫拉特关系研究》，第69页。

④详见马汝珩：《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辨》，载《清代西部历史论衡》，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6-292页。李保文认为：在蒙古佛教史上至少有四个活佛转世系统都冠以“伊拉古克三”，有数十人被达赖喇嘛、班禅或清廷封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李保文：《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载《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第52页）

参考文献

- [1] 达力扎布. 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J]. 中国藏学, 2008, (3): 72-80.
-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 清内秘院蒙古文档案汇编[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2003. 190.
- [3] 李保文. 大清国与蒙古喀尔喀汗国——1655年[A]. 史料与地域文化研究丛书[C]. 2004. 100-106.
- [4] 清太宗实录[M]. 卷五一, 崇德五年二月辛酉,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
- [5] 巴根那. 16-17世纪的喀尔喀与卫拉特关系研究[M]. 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年, 第52-65页.
- [6] 喇达那巴达喇. 咱雅班第达传[M]. 蒙古文, 西·诺尔布校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77页.
- [7] 咱雅班第达传[M]. 前言, 第5页.
- [8] [苏] 伊·亚·兹拉特金. 准噶尔汗国史[M]. 马曼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80.
- [9] 阿旺洛桑嘉措. 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M].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陈庆英, 马连龙, 马林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1997. 182-183, 195.
- [10] 王克, 陈庆英主编. 西藏历史文化辞典[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8. 114.
- [11] 释妙舟. 蒙藏佛教史[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9. 74.
- [12]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 安多政教史[M]. 吴均, 毛继祖, 巴世林译,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9. 149.
- [13] 蒙古及蒙古人[M]. 卷二, 第516-518页.
- [14] 李保文. 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M]. 第57页.

- [15] 东方文献主编. 1636-1654 年俄—蒙关系文献汇编 [M]. 莫斯科, 1974. 96, 102, 107.
- [16] 清世祖实录 [M]. 卷三二, 顺治四年五月乙丑条.
- [17] 马汝珩, 成崇德. 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辨 [J]. 民族研究, 1986, (5): 62-75.
- [18] 金成修. 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12-213.
- [19] 古蒙古汗统大黄史 [A]. [苏] H. П. 沙斯契娜. 《沙喇图济》—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 抄本,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7. 91.
- [20] 善巴. 阿萨喇克其史 [M]. 蒙古文, 乌兰巴托, 2002. 60 页上.
- [21] 姑茹玛. 入清前的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 [M]. 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22] 蒙古及蒙古人 [M]. 卷二, 第 517 页, 写作“阿南达达赖朝伦”.
- [23] 拉喜彭斯克. 水晶珠 [M]. 胡和温都尔校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904-905.
- [24] 张穆. 蒙古游牧记 [M]. 台湾: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5 年, 卷之九.
- [25] 清世祖实录 [M]. 卷 31, 顺治四年夏四月丙子.
- [2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M]. 卷九百六十三, “理藩院 · 喇嘛年班”, 中华书局影缩本, 1991.
- [27] 蒙古及蒙古人 [M]. 卷二, 第 518 页.
- [28] 蒙古游牧记 [M]. 卷之九.
- [29] 释妙舟著. 蒙藏佛教史 [M]. 第 153 页.

Researching about the third Erdeni Ilkaksan Khutugetu Zhaxidunzhu

Guruma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Kuriletai between Khalha and Oirad in the 1640, the fifth Dalai Lama sent Gongbenqujie Zhaxidunzhu as the supply lama of Sholoi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Chechen tribe. After that, he had branded a title as the *Erdeni Ilkaksan Khutugetu*, and controlled the whole religious affairs of Sholoi Khan. This thesis has researched the history background and lineage of Ilkaksan Khutugetu after reached Khalka.

Key words: Khalkha Mongol; Chechen Khan Tribe; Ilkaksan Khutugetu

收稿日期: 2014-09-21;

作者简介: 姑茹玛 (1970—), 女,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研究方向: 明清民族史、喀尔喀史。